

# 楊逵和入田春彥 ——臺灣作家和總督府日本警察

張季琳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關鍵詞：楊逵 臺灣作家 入田春彥 魯迅作品

## 一、前言

楊逵（本名楊貴，1905-1985）在臺灣文學史上的重要成就，已普受世人肯定，特別是論及日治時代以日語從事創作的臺灣作家時，首先必定談到他。楊逵生長在臺灣的日本殖民時期，自幼接受日語的初中等教育，他的文學啓蒙主要是透過日語或日語翻譯的小說，而知曉世界文學；早期的主要文學活動則是與日本的出版文化、日本作家的交流，並因某些日本文化人，而對他的人生和文學產生各種形式的影響。

一九三四（昭和九）年，楊逵以日文小說〈新聞配達夫〉（以下稱〈送報伙〉）入選為東京ナウカ社刊行的左翼文藝雜誌《文學評論》創作獎第二名（第一名從缺），並被刊載在該雜誌的第一卷第八號（1934年10月）。楊逵因此成為第一位躍上日本中央文壇的臺灣作家。〈新聞配達夫〉於一九三六年，經魯迅（本名周樹人，1881-1936）弟子胡風（本名張光人，1904-1985）翻譯成中文<sup>1</sup>，

<sup>1</sup>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楊逵逝世，同月三十日，胡風在北京的楊逵追悼會上講演〈悼楊逵先生〉說：「三十年代初，我在日本的普羅文學上讀到了先生的中篇小說〈送報伙〉……這篇作品深深地感動了我，我當即譯了出來，發表在當時銷數很大的《世界知識》上。後來新文學研究會還把它譯成了拉丁化新文字本，介紹給中國的文友們閱讀。」〈送報伙〉之後又

題名為〈送報伏〉，刊載在一九三四年，上海出版的《世界知識》雜誌，鼓舞了當時中國大陸反帝國侵略的民族意識。楊逵八十年的生涯，可以說和臺灣近代文學的發展密不可分。特別是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五一年時期，楊逵就像臺灣新文學運動的一面旗幟，在臺灣文學界發揮核心的作用。因此，考察楊逵的作品與文藝活動，在臺灣文學史的研究上，實具有重要意義。

在楊逵生涯中曾有幾位日本人對他產生重大的影響，臺灣總督府日本警察入田春彥（1909-1938）就是其中一位。楊逵與入田春彥交往的時間雖極短暫，卻為楊逵的文學生涯帶來重大轉機。特別是入田春彥將魯迅的作品介紹給楊逵這一件事，更令入田春彥的出現，有特殊意義。雖然楊逵與入田之間的交往久為人知，其友情的重要意義也為楊逵文學的研究者所認知，但是直到現在，學界對於入田春彥的出身、經歷和背景，卻所知有限。

筆者數年來對楊逵和入田春彥的交往頗為關心，並進行相關調查。筆者首先蒐集目前尚不為人知、不曾被使用的有關入田春彥及其與楊逵交往的資料。這些資料有些甚至連楊逵本人也不知道，例如入田春彥的身世背景等。另外，筆者曾親自和入田春彥的遺族見面會談。本文的調查研究，不但使入田春彥生涯的未知部分得以重見天日，並揭開入田春彥如何將魯迅文學介紹給楊逵的謎底，從而確認入田春彥對楊逵的影響比歷來所能想像的更大、更多。

## 二、楊逵和入田春彥的結識

一九三五（昭和十）年十二月，楊逵創辦文藝雜誌《臺灣新文學》<sup>2</sup>，由於總督府警察的檢閱查禁等原因<sup>3</sup>，在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六月停刊。楊逵隨即到東京訪問《日本學藝新聞》、《文藝首都》、《星座》等刊物的責任編輯，希望能在日本獲得發表臺灣作家作品的專頁。不料七七事變後，日本國內也加強文藝思想的管制取締。楊逵失意地返回臺灣，不久就因為罹患肺結核，咯血不

---

被收入《山靈—朝鮮臺灣小說集》，作為巴金主編的《譯文叢刊》之一種，一九三六年四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參見周夢江、王思翔：《臺灣舊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頁83-94。

<sup>2</sup> 河原功：〈《臺灣新文學》の發刊〉，《臺灣新文學運動の展開—日本文學との接點》（東京：研文出版，1997年），頁222-230。

<sup>3</sup> 參見拙論：〈楊逵と《臺灣新文學》〉，《臺灣プロレタリア文學の誕生—楊逵と「大日本帝國」》（東京：東京大學大学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論文ライブラリー，コンテックス株式會社，2001年），頁77-119。

斷，無法工作；妻子葉陶也因過度勞累而病倒；楊遠甚至還因二十圓的欠款而被米店老闆告到法院。就在這極端窮困的時候，日本年輕警察入田春彥奇蹟似地出現在楊遠面前<sup>4</sup>。戰後，楊遠初次談起這位警察，是在一九七六年接受作家宋澤萊訪談的時候。楊遠說：

當時設首陽農場亦頗艱辛，有一位朋友幫我覓了地，約有二百多坪，要定金三十元，我已一文不名，欠了米店二十元，無力償還，竟吃了官司，我想多半是日警唆使那位老闆提訴我，因為我是那米店的多年主顧。有趣的是，那時《臺灣新聞》學藝壇編輯田中帶了一位日警來見我。他叫入田，寫過一篇〈入田春言〉，在文章中表示很希望見我。他看到我的落魄相，資助了我一百元，債竟然因之還清，農場才買下來。<sup>5</sup>

根據楊遠戰前文章〈首陽園雜記〉<sup>6</sup>以及楊遠遺族的回憶，可知這農場是租借的，不是買的。對於米店老闆的控告，楊遠則認定是日本警察唆使的結果，這一點也頗有趣味，因為楊遠對警察向來沒什麼好感。例如他曾說：

十二歲，父親的一位好朋友，做小生意，無緣無故被日警打死，又加深我和現狀社會的衝突，日後所聞，諸多不合理的事更深深給我挫傷和震動。<sup>7</sup>

又說：

有一天，我發現前一日草叢中的藏著的新鋤頭不見了蹤影。平日來監視我「尾刑」<sup>8</sup>的日警特務告訴我，派出所有人檢到一把鋤頭，可以去認領一下。我去了，發現是一把生了鏽的舊鋤頭，不是我的，但他們還是要我拿回去暫時使用。花園就是這把不知道是誰的鋤頭一鋤一鋤開闢出來的。<sup>9</sup>

<sup>4</sup> 楊遠和入田春彥結識前的簡歷，係根據日本《文藝》（1983年3月）的楊遠談話記錄。參見註11。

<sup>5</sup> 此訪問記錄中所說「入田春言」，可能是入田春「彥」的誤記。宋澤萊（本名廖偉竣）：〈不朽的老兵〉，《師鐸》第4期（1976年）。本文轉引自陳芳明編：《楊遠的文學生涯——先驅先覺的臺灣良心》（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年），頁211。

<sup>6</sup> 楊遠〈首陽園雜記〉：「最近承蒙剛認識友人的厚意，得以租借三百坪左右的土地。」（筆者譯）（見《臺灣新聞》，1938年3月30日-4月2日）

<sup>7</sup> 宋澤萊：〈不朽的老兵〉，頁207。

<sup>8</sup> 原文「尾刑」，應作「尾行」，日文意思是「跟」。

<sup>9</sup> 楊遠口述，女兒楊素絹筆記：〈光復前後〉。本文原載於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四日《聯合報》，後收入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編：《文學史話》（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81年）。本文轉引自楊遠：《壓不扁的玫瑰》（臺北：前衛出版社，1986年），頁192。

另外，成名作〈送報伙〉中，也有一段臺灣母親因為兒子當警察而斷絕母子關係的情節。有趣的是楊遠本人卻因為警察，且是日本人警察的資助，才渡過人生一大難關。

一九八〇年〈光復前後〉一文中，楊遠更詳細地談到入田春彥，並初次說明入田春彥是位文學愛好者：

在這毫無辦法的時候，有一天，《臺灣新聞》副刊主編田中保男，帶了一位入田春彥來訪問，他們都是日本人。據田中先生介紹，說入田春彥是警察，素好文學，曾讀過我的〈送報伙〉，早就想來找我聊聊。那時，我吃飯都成問題，常常變賣幾本書，換得幾角錢，去買一紙口袋米，燒稀飯維生。兩位日人朋友，見此光景，特地去買菜沽酒來，大家邊飲邊談天。當入田春彥瞭解我當時的情況，立即掏出一百圓來濟助。他們回去以後，我把米店和雜貨店的債還清楚。最後，只剩三十圓，就利用這三十圓去付了地租訂金，結果連一把一塊多錢的鋤頭也買不起了，只好向人家借用。<sup>10</sup>

一九八二年八月，七十七歲的楊遠接受美國愛荷華大學的邀聘，赴美訪問，在返回臺灣途中，順道遊訪睽違五十年之久的日本。在東京，楊遠與內村剛介、戴國輝兩位教授「對談」的內容也大致相同：

在這束手無策之時，有人對我伸出了援手，那個人叫入田春彥（Irita Haruhiko），是一位日本警察。有一天，臺灣新聞社的學藝部員田中保男和一位陌生的日本青年來到我家。我和田中保男從以前就熟識的，而那位陌生的青年則是警察，因為讀過我的〈送報伙〉受到感動，一定要和我見面，就拜託《臺灣新聞》學藝部促成。那個晚上，兩人帶來了酒和菜肴一起飲酒歡談，直到夜深，二人才回去。回去時，那陌生的日本青年親自遞給我一百圓巨款，叫我拿去用。我就用那一百圓，還了米店的欠款，用剩餘的錢租了二百坪的土地，開始經營農園。那位對我來說簡直是救星的陌生日本青年，就是入田春彥。我將這農園取名為「首陽農場」。<sup>11</sup>（筆

<sup>10</sup> 同註9，頁190。

<sup>11</sup> 〈一臺灣作家の七十七年——五十年ぶりの來日を機に語る〉，《文藝》1983年1月號。以下皆稱「對談」。此對談記錄在臺灣有二種中文翻譯：（一）葉石濤譯：〈一個臺灣作家的七十七年〉，《臺灣時報》1983年3月3日，收入陳芳明編：《楊遠的文學生涯》；（二）陳中原譯：〈楊遠的七十七年歲月——一九八二年楊遠先生訪問日本的談話記錄〉，《文季》第1卷第4期（1983年11月），收入戴國輝：《臺灣史研究》（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

者譯)

綜合楊逵的說法，愛好文學的日本警察入田春彥，因為閱讀了楊逵作品〈送報伏〉，深受感動，而在一九三七年秋天特別拜訪楊逵，並送給楊逵一百圓巨款，幫助了正陷於困境的楊逵<sup>12</sup>。

### 三、從宮崎到東京、臺灣

一九八二年的「對談」中，楊逵如下述入田春彥的身世：

他的經歷，我什麼都不知道。他也從來不談自己的事情。詢問他的警察同事，一點也不告訴我。入田先生是九州人……〔中略〕，好像曾聽他說過是出身熊本縣。（筆者譯）

但是，根據臺灣總督府《警察職員錄》等資料，可確定入田春彥出生在宮崎縣，不是熊本縣人。而經過多方面調查後，筆者終於和住在宮崎縣的入田遺族會面<sup>13</sup>，且根據入田遺族的證言和戶籍謄本等相關資料，大致整理出入田春彥的身世如下：

「對談」中，楊逵將入田春彥的發音讀成「Irita Haruhiko」，實際上「入

<sup>12</sup> 入田春彥很早就是楊逵所創辦文藝雜誌《臺灣新文學》的忠實讀者，並加以聲援。《新文學月報》第2號（1936年3月）「明信片」讀者通信欄（頁10），刊載讀者「鄉親良」來函：「《臺灣新文學》的發刊，令我深受鼓舞。我想，要應付現在這種混沌的轉換期，無論到哪兒都需要強韌的生命力。尤其擔任編輯的各位先生，是難以忍受這殖民地的×××××吧。無論從何種情況來考量，都可以想像出《臺灣新文學》的明天是遍布荊棘的道路。請務必經得起考驗。一起加油吧。」（筆者譯）「鄉親良」是入田春彥的筆名之一。

<sup>13</sup> 筆者根據日本臺灣協會《會員名簿》（1984年10月版、1995年9月版），向戰前臺灣總督府的警察相關者發出詢問信函，結果得到水越昇的回信。水越昇說，他雖然知道入田這個人，但是對他沒有什麼特別印象。水越昇並指點筆者直接向入田出身當地的警察本部查詢。實際上，入田春彥的小品文〈日錄抄〉「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臺灣新聞》1938年12月17日）的一節寫著：「夜，水越先生、佐藤先生十時十分前來交班，水越先生好像疲累了。」（筆者譯）關於這一點，再次向水越昇詢問的結果，水越昇回函說他不記得有這件事。於是，筆者經由宮崎縣警察本部稻田三千男警視和寺元達也記者的協助，在《宮崎日日新聞》報紙登載尋人啓事。不久，就和入田遺族在九州的宮崎市、日向市見面，同時也去祭拜位於宮崎縣高岡町的入田春彥衣冠塚，並和當時仍健在的入田春彥的小妹江藤夕シ談話，也和春彥已故姊妹們的子女等二十多人會面。

田」的正確發音應該是「Nyuta」<sup>14</sup>。入田春彥（Nyuta Haruhiko）生於一九〇九（明治四十二）年三月五日，是「宮崎縣東諸縣郡高岡村大字內山三〇〇六番地」入田安之進的獨子，上有二位姐姐，下有二位妹妹。一九一五（大正四）年出版的《宮崎縣大觀》，刊載著入田春彥的父親安之進和從事農學教育的伯父川添龜之進的簡介<sup>15</sup>。入田家可說是屬於知識階級，生活也相當安定。但是，一九一六（大正五）年，安之進在妻子（春彥的母親）過世（當時春彥七歲）後，經濟生活逐漸窮苦。根據入田春彥的小妹江藤タシ（Eto Tatsu，八十一歲）的談話，入田春彥自高岡小學、舊制宮崎中學畢業，曾在東京府當過一段時期的公務員，之後，因為經濟關係渡海到臺灣。小妹タシ印象中的春彥是非常溫和、體貼的大哥，他在東京工作時，甚至到臺灣後，仍然按月郵寄十圓或十二圓回故鄉。後來，年老的父親安之進為投靠獨子春彥，也乘船渡海到臺灣，沒想到不久就病逝於臺。遺憾的是和入田春彥相差七歲的妹妹タシ，無法想起大哥春彥去東京或臺灣的詳細年月，也不記得父親安之進大概是什麼時候去臺灣的。而根據戶籍謄本的記錄，入田安之進是在一九三五（昭和十）年八月十九日，病逝於「臺灣臺中州南投郡中寮庄鄉親寮三二四番地」，享年六十三歲。提出死亡登記者是入田春彥本人<sup>16</sup>。

<sup>14</sup> 為什麼連與入田深交的楊遠也錯讀「入田」的發音呢？筆者推測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就是入田不想讓楊遠知道太多自己的私事，以保護楊遠。第二就是太多人讀錯音，入田懶得一一更正吧。例如，中國的「龔」姓也有兩種讀音。

<sup>15</sup> 白石清泉編《宮崎縣大觀》（1905年）以「東諸縣郡高岡村助役入田安之進君 東諸縣郡高岡町」的標題（頁159），如下介紹入田安之進：「君是舊鹿兒島藩士，生於明治五年九月十二日。夙從事農業，二十年左右開始造林事業，並逐步順利豐收。二十八年至四十年，奉職高岡稅務署。四十四年七月，被推舉就任高岡村助役至今。」（筆者譯）《高岡町史》（頁202）也記載入田安之進擔任「助役」（副村長）的三年任期，是從一九一一（明治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一九一四（大正三）年六月十七日。又，根據入田遺族提供的戶籍謄本知道，入田安之進原姓川添，十九歲時，成為同村鈴木兵右衛門的養子，三年後終止收養關係。二十六歲時，又成為同村入田モヨ（Nyuta Moyo）的養子。另一方面，《宮崎縣大觀》也以「從六位 農學士川添龜之進君 東諸縣郡高岡町」的標題（頁137），介紹安之進的親大哥川添龜之進：「君生於明治三年十月。二十九年，自高等中學造士館畢業後，就讀東京帝國大學農科大學（譯按：今之農學部）。三十七年七月畢業，獲農學士學位。同年任福島縣蠶業學校教諭，之後成為該校校長。三十八年十月，轉任山梨縣農林學校校長，兼任同縣技師，從事農桑設施工作。四十四年，奉任廣島縣技師，兼任西條農學校校長、廣島縣農事試驗場場長。大正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辭職返鄉。」（筆者譯）

<sup>16</sup> 江藤タシ告訴筆者，因為入田春彥只寄了一張父親葬禮的照片回故鄉，所以春彥歿後，四

筆者曾在東京都立公文書館，調閱當時東京市府廳的職員錄和臨時雇員的名簿，並未發現入田春彥的名字；另經由入田遺族向現今宮崎中學校查詢的結果<sup>17</sup>，也因為該校學籍簿只保存十年，而無法確認入田春彥是否自該校畢業。筆者根據《臺灣警察時報》等資料，入田春彥的簡歷大致整理翻譯如下：

(一)一九三一（昭和六）年九月

——「〔入田春彥〕警察官部乙科第一七九屆生，屬第五班，九月二十二日入所，自九月二十三日起，受訓六個月。」（《臺灣警察時報》「練習所通信」，昭和6年10月號，頁42）

(二)一九三二（昭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入田春彥〕第一八屆警察官部乙科修了生，臺中州。」（《臺灣警察時報》，昭和7年5月號，頁114）

(三)一九三二（昭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任免令〕臺中州，巡查，月四，三月二十八日，入田春彥。」（《臺灣警察時報》，昭和7年9月號，頁171）

(四)一九三二（昭和七）年十一月一日

——「臺中州，南投郡，巡查，月四，入田春彥，宮崎。」（《警察職員錄》，昭和8年版，頁74）

(五)一九三二（昭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月俸給四十一圓，臺中州巡查，入田春彥。」（《臺中州報》第969號，頁453）。

(六)一九三三（昭和八）年十一月一日

——「臺中州，南投郡，巡查，月四十一，入田春彥，宮崎。」（《警察職員錄》，昭和9年版，頁76）

(七)一九三四（昭和九）年十一月一日

——「臺中州，南投郡，巡查，月四十二，入田春彥，宮崎。」（《警察職員錄》，昭和10年版，頁79）

(八)一九三六（昭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任免異動〕：臺中州，新高郡，五月十八日，巡查，入田春

姊妹們就完全不知道安之進、春彥父子的遺骨所在，只能在故鄉為兩人建衣冠塚而已。

<sup>17</sup> 入田春彥的大姊野元千ツ（Nomoto Chitsu）的四女松山紀子和其夫婿松山武正。

彥。」(《臺灣警察時報》，昭和11年7月號，頁202)

(九)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七月一日

——「新高郡，Kanetowan 警察官吏駐在所，巡查，月四十五，入田春彥，宮崎。」(《臺中州及所屬團體職員錄》，昭和12年版，頁80)

(十)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

——「臺中州，臺中警察署，巡查，月四十五，入田春彥，宮崎。」(《警察職員錄》，昭和13年版，頁74)

(十一)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臺中州巡查，入田春彥，依願免除本職。」(《臺中州報》第1782號，頁469)

在殖民地時期的臺灣，想擔任巡查(警察)工作，需要什麼樣的條件呢？參閱一臺灣總督府警察兼司獄官練習所教官鷺巢敦哉的著作《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警察生活の打明け物語》、《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等<sup>18</sup>，皆有助於瞭解當時日本人渡海來臺，參加警察的招募、培訓及執行任務的情形。不過，與入田春彥同樣出生於宮崎縣，且自一九三四(昭和七)年起，在高雄擔任警察勤務多年的吉岡一二，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寫給筆者的信函中，則提供了更直接與實際的資料：

關於您所詢問臺灣警察的招募和養成之事，當時(日本戰敗前)臺北市八甲町有座宏偉的建築設施，這是臺灣全島的警察養成練習所。這所培養巡查的學校，平時有四班左右(一班六十名)的乙科學生，每次大約有二百四十名入學，學習六個月後，就任命為巡查，分發到臺灣各州廳。老師是由臺灣總督府的事務官以及從各州調來的現役警部組成。乙科生的成員則是由學校的教官擔任考試官，三人一組地去日本內地各處巡迴募集、考試而來。學歷不拘。筆試科目包括國語、算術、作文。通過面試後，再經嚴格的身家調查以後才能錄取。一年有幾次乙科生的募集，每次約有六十名(一班)訓練生不斷地入學，因此學校經常保持二百四十名左右的乙科生在學。雖然我只是小學校畢業，卻也是經過努力的用功，好不容易才考試合格(不需經由推薦)。

<sup>18</sup> 鷺巢敦哉：《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臺北：臺灣總督府出版，1932-1933年)、《警察生活の打ち明け物語》(臺北：個人出版，1934年)、《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臺北：個人出版，1938年)。



那時候臺灣巡查的基本月薪是三十五圓，比內地的巡查多五圓左右，是相當吃香的工作，所以應徵的人非常多。經常一個試場就聚集五十多名應考生，而從中只錄取兩名或三名而已。合格者也有幾位是大學畢業生。每次所募集的人員大約六十位，程度大部分是中學畢業，小學畢業的比較少，考試非常難（尤其是對只有小學程度的人而言）。至於在校的訓練則完全是住宿制度。有漂亮的宿舍，宿舍的生活和當時的軍隊差不多同樣嚴格。學科方面的學習有：刑法、刑事訴訟法、商法、民法、憲法等。每個月考試一次，競爭激烈，相當辛苦。實技科目有：軍事教練、柔道、劍道，這也需要考試的。由於受訓是如此的辛苦，因此健康強壯的人，才能勉強畢業。宿舍內雖然可以自習，不過還是需要在有限的時間內，盡最大的努力來學習。（筆者譯）

從吉岡一二的回憶，大略可以想像出入田春彥也是在日本筆試合格，再經過身家調查後來到臺灣，進入臺北警察養成訓練所，接受嚴格的職前訓練。

根據一九三一（昭和六）年十月十五日《臺灣警察時報》第四十一號「練習所通信」的專欄，刊載警察養成訓練所教官三宅生〈第一七九回生第五班入所〉、〈新入會員紹介〉的報導，可以知道「入田春彥（宮崎）」是在一九三三年（昭和六）年的九月二十二日，和其他從內地招募而來的日本人，以警察部乙科第一七九屆第五班受訓生的身分，進入警察養成訓練所，並從二十三日起，正式接受為期六個月的訓練。而在前述「練習所通信」的專欄，也刊載著第五班學生參觀建功神社和博物館所拍的二張照片，並標示「參拜建功神社 第五班」、「參觀博物館 第五班」。不過，由於印刷不清楚，無法識別哪張面孔才是入田春彥。

一九三二（昭和七）年五月《臺灣警察時報》第四十九號，三宅生「練習所通信」專欄，報導了三月二十八日「第一八回警察部乙科修了生第六班」的結業典禮和結業生的名單。原來應該是屬於第一七九屆生第五班的入田春彥的名字，竟然又出現在這份名單內，且記載著他被分發到臺中值勤。入田遺族目前保留著春彥唯一的親筆函，是他從臺灣寄給二姊リツ（Ritsu）和其夫婿梅橋秀雄的明信片<sup>19</sup>。根據這張明信片所寫的內容，入田春彥在受訓時曾一度病倒，可能

<sup>19</sup> 這張明信片的內容如下：「久疏問候，祈見諒。不肖因病住院，而延遲原應在二月八日離開練習所之期。四月十一日起，服務於下址，勿此簡單通知。病已痊癒。臺中州南投郡警察課。四月十六日。入田春彥。」（筆者譯）

因此而延遲一屆結業。

那麼，入田春彥成爲巡查之後的工作態度如何呢？曾擔任入田的上司，原南投郡巡查部長的瀧澤政比古，在署期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五日的信函中，如下回答筆者：

所問有關入田春彥君當時的詳細情形，就我現在的記憶來說，相當遺憾，非常的稀少。入田君當時是南投郡警察課負責外勤的單身巡查，年青的美男子，文靜穩重。印象中我總覺得他看起來似乎是個寂寞的孤獨青年。在我看來，他的勤務態度普通。我一點也想不起任何我曾和入田君交談過的記憶。（筆者譯）

「對談」中，楊達說過他對入田的印象是：「大概剛從大學畢業，約二十四、二十五歲左右，是個文靜穩重的男人。」（筆者譯）實際上入田當時已經三十歲了。筆者推測他可能沒有大學畢業的學歷，但是，由於出生自地方名士的家庭，且是文學青年，所以有一種優雅教養的氣質，楊達才誤以爲入田春彥是大學畢業。

年青的日本警察入田春彥像救命之神般，突然出現在正處困境的楊達面前，並親手送給楊達一百圓的巨款。當時入田春彥的基本月薪不過四十圓左右，他還得從薪水抽出部分寄回家鄉。入田春彥將超過二倍月薪的一百圓巨款，送給初次見面的被殖民者的臺灣作家楊達，不得不說是極果斷的決心。他和楊達初次見面，就立刻掏出大筆金額給楊達，可見入田春彥是預先就準備好，特意帶來要幫助楊達的。

入田春彥和楊達的友誼就這樣地展開，這段交往包含整個家族的極親密關係<sup>20</sup>。筆者在楊達的次男，現積極從事建設楊達紀念館的楊建（六十歲）協助下，在一九九七年五月，先以電話訪問楊達的長男，經營資生花園的楊資崩（六十五歲）。同年八月會面時，資崩向筆者暢談對入田春彥的記憶<sup>21</sup>。楊資崩說，當時他才六歲，經常去入田的宿舍玩耍，時常獲贈糖果點心或兒童書籍等禮物，入田並爲他朗讀故事書，也教他唱「勝利歸來」之類的日本軍歌。直到現在，楊

<sup>20</sup> 楊達〈首陽園雜記〉記述，由於入田春彥的援助才開始經營首陽園農場。同文也提到，楊達曾和入田一起拜訪，住在八卦山腹的朋友黃朝東。

<sup>21</sup> 當時以非常懷念的神情，暢談入田春彥的楊資崩，不幸於一九九八年四月病逝。一九三二年，楊達取「資本主義崩壞」之義，爲長男命名。

逵遺族仍珍貴地保存著楊逵、春彥和資崩當年一起拍攝的相片<sup>22</sup>。

#### 四、「赤化」警察的自殺

一九三八年五月，入田春彥突然自殺<sup>23</sup>。由於入田生前不曾對楊逵談過個人事情，因此楊逵無法將他的遺骨交還給遺族。於是楊逵將入田春彥的遺骨，收存於自宅十多年。戰後，一九四九年，楊逵因起草〈和平宣言〉，被國民黨政府關入綠島監獄，長達十二年之久。楊逵入獄期間，國民黨政權下的警察仍經常到他的住宅搜索調查。為了避免莫須有的麻煩，當時年僅十八歲的楊資崩，請求寶覺禪寺住持林錦東協助，將入田的遺骨免費安置在寺內。寶覺禪寺位在臺中市，戰前便以安置長眠於中部臺灣的日本人遺骨有名。一九九七年五月，筆者訪問寶覺禪寺，確認了一九五（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資崩以楊貴（楊逵本名）夫婦的名義，安放入田春彥的遺骨<sup>24</sup>。

戰後，楊逵曾幾次談過入田春彥的死亡。一九七六年〈不朽的老兵〉的訪談記錄中，楊逵說：

入田後來常在我這邊出入，寫了不少揭發日警界黑暗面的文章，因而頗得罪了一些人，被日警方勒令出境。臨出發前一天，他給我一封信，表示晚上要見我，我去時，他的房門緊閉，等鄰人撬開房門。他已服安眠藥自殺，死在床上，遺囑我替他料理後事，我曾在報紙寫了一篇文章來記述這

<sup>22</sup> 陳春玲、黃滿里、邱鴻翔文編：《楊逵影集》（臺北：滿里文化工作室，1992年）。

<sup>23</sup> 入田遺族說，當時從臺中寄來一通電報，告知入田春彥死亡的消息。但是直到筆者到宮崎訪問前，入田遺族並不知道入田自殺的事實，也不知道正確死亡日期，只能根據電報時間，在入田墳上註明死亡日期是「昭和十三年五月九日」。

<sup>24</sup>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中旬，入田春彥的外甥女藤江綾子（七十二歲，退休小學教師）和夫婿藤江隆夫（退休法官）到臺灣。在楊建的引導下，拜訪臺中寶覺禪寺，舉行法會後，平安領回入田的遺骨。臺灣的傳播媒體曾報導這件消息。藤江綾子是入田大姊野元千子的長女，小學退休教師。她不曾見過舅舅，但是從小知道母親很擔心舅舅遺骨之事，因此師範學校畢業後，用第一個月的薪水為舅舅建造衣冠塚，以表達對母親的孝心。另外，一九六一年，當時駐臺灣的日本大使館曾製作編輯一冊《物故者名簿》，以整理戰前分散在臺灣各地的日人遺骨墓地。筆者在東京的臺灣協會調查這份名簿，發現登記著：「入田安之進（埋葬地區）南投縣三塊厝。」於是一九九七年五月，訪問臺中寶覺禪寺，確認遺骨的存在後，和楊建聯絡，與他再次訪問寶覺寺，開始進行領取遺骨的手續。而入田春彥的小妹江藤夕シ，一九九九年底，為父親和大哥在家鄉處理安葬事宜後，於次年春天逝世。

件事。

根據這個記述，入田春彥由於寫過許多有關日本警察黑暗面的文章，被強制驅逐離開臺灣，因而吃安眠藥自殺身亡，楊逵並為入田撰寫追悼文。四年後，楊逵〈光復前後〉一文中，則說入田春彥之所以被逮捕，是因為贈送楊逵一百圓的緣故：

入田常在我這進出，給我幫忙，又因為贈我一百圓而被抓去派出所關了好幾天。之後日方決定放他出去，放得遠遠的一限令他離臺返日。他在被釋放之後，托人拿了一個條子給我，要我次日晚間七點到他住處去找他。第二天我依約前往，七點鐘到達他的門外。房內傳來陣陣呼吸聲，叫門卻無人來應。門鎖著，呼吸聲斷續傳來。我感覺很奇怪，趕忙去找管理公寓的阿婆拿鑰匙。回來時，呼吸聲已經止息；開門一看，入田已昏迷在榻榻米上，原來他在知道要被遣返日本之後，就已經決定一死了啊。他在身旁留了兩封遺書，一封是給我的，表明他對中國人的感情及對日本殖民統治與發動侵略戰爭的厭惡。另一封是留給我的妻子葉陶，請求葉陶替他整理遺物，並表示願將他的骨灰當作肥料，遍灑在我花園的泥土中。第二個要求我們並未遵命照辦。我們一直想辦法聯絡他在日本的家人，但失敗了。至今，入田的骨灰仍寄存在臺中寶覺寺中。

一九八三年，楊逵在日本的「對談」內容，又有些變化：

不久，入田春彥辭去警察職務，常常來我家玩。那是在進入一九三八（昭和十三）年以後的事。入田春彥受到警察逮捕，被拘留了四、五天，且被命令從臺灣遣返日本內地，他無法繼續待在臺灣。在他被釋放後沒幾天，我收到入田的紙條，一看，上面潦草地寫著希望今晚七點能來。我一到達他的宿舍，就聽見房間有痛苦的呼吸聲。我立刻察覺有異，馬上就想衝入房間，但是門是上鎖的。我從管理員老太婆拿來鑰匙急急衝入房內，他已經是神識不清的狀態了。好像正作著惡夢似的，好幾次好幾次都叫著我的長男資崩的名字。由於吃了大量的安眠藥，可見是下定必死決心的自殺。雖然把他抬送到醫院，卻已經遲了。在醫院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入田就死了。留下二封遺書，給我和內人。寫給我的遺書中只寫著，你應該可以了解我的心情。寫給我內人的內容，則是委託她代為處理後事，希望將自己的遺體燒成灰，當成花肥使用……。就在我的首陽農園附近，有個火葬場。入田的遺體就是在那火化的。我撿拾了他的骨灰。那個骨罈子，我一直都收存著。一九四九年，我遭逮捕，關入火燒島（現稱綠島），我

的家人無法處理，就安置在臺中的寶覺寺。所以，他的骨灰現在還在那個寺院裏。實在是沒有什麼線索，如果能找到他在日本的遺族，我想把骨灰交還給他們。（筆者譯）

「對談」中說入田斷氣是在楊逵到達他的房間，將他送往醫院之後的事情。這和前引一九七六年的訪談記錄中，楊逵來到房間時，入田春彥已經氣絕的說法，大不相同。這個「對談」還提到兩封遺書和處理遺體之事。筆者在一九九七年九月、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分別訪問楊逵的長男楊資崩和長女楊秀俄（七十三歲）<sup>25</sup>。根據他們的談話，當時入田春彥幾乎每天來楊家用晚餐。那天晚上，入田卻一直沒來。於是楊逵讓秀俄（當時九歲）和弟弟資崩（當時六歲）去找入田。兩人就跑去春彥住宿的地方，當他們到達時，房門並沒有上鎖，他們往面一看，看見入田躺在日式榻榻米上，身上蓋著棉被，兩人就叫喚他，但是，入田沒有回應。於是兩人跑回家告訴父親，楊逵夫婦立刻衝出家門，去找入田春彥。秀俄、資崩的回憶和楊逵的談話、文章述大為不同<sup>26</sup>。

另一方面，當時臺灣最大的日文報紙《臺灣日日新報》，在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五月七日（星期六），以「原巡查因對前途悲觀，於公寓服毒自殺」的標題，報導入田春彥的自殺事件：

（臺中電話）臺中市寶町四五二寶町公寓十五室，宮崎縣出生的入田春彥（三一歲），自五日午後四時左右起，便一直關閉在自己的房間睡覺，而不用晚餐。公寓阿婆覺得可疑，於當晚十一點左右進入房間，發現同氏的枕邊散放著注射針藥和 Adalin 催眠劑的盒子。由於同氏已陷於昏睡狀態，於是立刻向錦町派出所呈報，並擡送到醫院急救，但已沒有生命跡象。枕邊留有寫給錦町派出所員警和友人的遺書，並寫著如何處理遺體之

<sup>25</sup> 當年九歲的楊秀俄，雖然非常喜歡入田春彥來家裏玩，但是因為個性內向，和入田春彥並不太說話。只是頗高興他有時會送糖果給自己。一九三〇年，楊逵取「優秀俄羅斯」之義，為長女命名。

<sup>26</sup> 比較楊逵晚年的各種回憶紀錄，可以發現內容多少有些不同。作家葉石濤（1925-）〈楊逵與臺共的關係〉一文說：「楊逵先生從來不批評人。晚年腦筋有點混亂，說話有時不連貫，所以偶爾會不經意的輕輕流露出埋怨，但絕不說出埋怨的原因。所以我們無從知道他對某人，心懷有怎樣的評價。後來他講的有關他生涯的各種階段的敘述，都是經過編造和選擇創作的，幾乎都有同樣的內容和敘事觀點。」（見《走向臺灣文學》〔臺北：自立晚報社，1980年〕，頁92-97）又，楊逵生前親筆寫給惠娜的信函中，也自述因腦循環器官障礙，無法正確記憶人名或過去所發生的事情（《聯合文學》1卷第7期，1985年6月）。

事。同氏於三個月前辭去臺中巡查之職，住宿於前記場所，預定搭乘六日的定期郵船返鄉。年輕時就對文學有興趣，巡查時代屢屢投稿某報文藝欄，最近因○○而依願免職。似乎是失業後，極度失望之餘而選擇死亡之途。（筆者譯）

這篇報導未提及楊逵，只報導入田除服食安眠藥之外，還注射過藥物。根據這則報導可以知道，入田不僅留給友人遺書，也留了一封遺書給錦町派出所員警，遺書中並叮囑如何處理自己的遺體。這篇報導說入田春彥自殺是因為失業後對前途失望，而失業的理由則是「因為○○而依願免職」。這以「○○」的避諱字體來表示，意味著入田有「赤化」的身分，也就是暗示入田春彥和左翼思想有所關連。

另外，一九三八（昭和十三年）五月七日，臺南市日文報紙《臺灣日報》也以「文學青年因孤獨感和生活不安，留下異常遺書自殺」的標題，報導入田春彥的自殺事件：

（臺中電話）五日午後十時半左右，臺中市寶町四五二寶町公寓的管理人，對於寄宿該公寓十五號房的入田春彥氏（三一），自傍晚就關在自己房間內不出門，覺得可疑，於是進入室內探看。發現同氏昏睡著，而枕邊散置著注射針藥和 Adalin 催眠劑的盒子，於是立刻向錦町派出所通報，同時請過醫學博士來緊急施救後，送進過醫院。但是因為服用相當多量的藥，並注射了兩劑劇藥的緣故，已沒有生命跡象。同氏枕邊放著留給錦町派出所員警和二三位友人的遺書，以及寫著關於處理自己遺體之事的列舉式的異常遺書等。同氏原任巡查，對文學深有興趣，並常投稿。最近離職後，更埋頭專注於文學創作，是極端的孤獨主義者。同氏原應搭乘五日的夜行列車離開臺中，再搭六日的定期郵輪返回內地。但是因為精神和物質上的緊迫困苦，以及孤獨的哀愁感愈為深刻嚴峻，而加劇神經衰弱。可以看出是要和春天共逝，抱著必死決心的自殺。（筆者譯）

《臺灣日報》的報導內容和《臺灣日日新報》大同小異，都記述入田不僅留下遺書給派出所同仁，也給幾位友人。應該注意的是，這兩篇報導都提到入田的遺書寫著如何處理遺體的事情。這應該就是楊逵在〈光復前後〉、「對談」所說「願將他的骨灰當作肥料，遍灑在我花園的泥土中」之事。不過，就現存入田春彥留給楊逵夫婦的遺書中，卻沒有任何一字談及遺體的處理事宜，或許另有一封寫著處理遺體之類的遺書吧。由於楊逵遺族慎重的保存，入田春彥寫給楊逵夫婦

的遺書，才能在本論文中初次公開：

葉陶女士

我想，你是最能迅速、俐落處理我的後事的人。

因此，我就不客氣地拜託了。

我想，在這樣的時代，有這樣的戰鬥也是好的。

能夠瞭解懷抱炸彈，欣然勇赴死地的一個士卒的心情的人，

大概也能理解我的心情。

讓資崩小弟為我唱「勝利歸來」的歌吧。

資崩以後到了我這樣的年紀時，

這世界不知道將變成什麼樣子。（筆者譯）

楊逵先生

我想你一切都瞭解的，所以我就沒必要再寫什麼。

這是戰鬥。我不希望被認為是卑怯的行為。

我的內心也存在著各種東西。

但是，芥川式的虛無，還算是有三分吧。

多估計的話，大概也有四分左右。

到了這樣的時候，我多少寵壞了芥川式的虛無，也是個事實。

但是，我給予了它令戰鬥更加激烈的任務。

我不希望被過重地評估芥川式的虛無。（筆者譯）

楊逵在一九三八（昭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的《臺灣新聞》，發表追悼文〈入田君のことごと〉（中譯〈入田君諸事〉）如下：

入田君的遺骨，在昨天早上撿拾回來。人類中的一位已經被終結了。那大個子的男人，現在被裝入這不到一尺立方的木盒子。說要決鬥、要戰鬥的這個熱情男人，現在已成為粉塊狀的骨片，莊嚴地裝在這個木盒裏。

五月四日前，那大個子的身體，以他獨特的步伐，咯咯答答作響的木屐聲，有時一天兩次來找資崩。但，那木屐聲，再也聽不到了。給葉陶的遺書中，他慷慨勇猛地自認是懷抱著炸彈，欣然勇赴死地的一個士卒。然而，其結果卻落到和炸彈一起掉入海的下場。炸彈終究沒有爆炸，而和他一起被海，被那無垠的大海所吞噬。為他那偉大、慷慨、勇猛精神所震驚的，大概只有徘徊在近處的雜魚而已。

爲什麼不更堅強的活下去？現在說這些已經無濟於事了。爲什麼我沒有像他那麼好的健壯身體？現在說這些也都只是於事無補的牢騷而已。「我想你一切都瞭解的。所以我就沒必要再寫什麼。這是戰鬥。我不希望被認爲是卑怯的行爲。」

留給我的遺書中，他是這樣寫著的。他還努力地估量他的芥川式虛無的分量有多少。即使盡我所能，如他的遺書所寫般地完全瞭解他，那又有什麼作用呢？如果他還活著對我說這種話語，我就會鏗鏘地飽以鐵拳而哭泣吧。但是，到了現在，以骨灰爲對手的我，還能做什麼呢？

無論如何，關於他的一生必須要各方面地思考。我也把這當成是一種負債，但是現在我的背部從肩膀到腰，陣陣地作疼，頭也沈重。現在我得稍爲休息才行。不過，這次從他的服毒到死亡之間，周遭的動向令我非常關心。這也是需要好好思考的。這是和人性相關的問題，也就是說，想要當一個像樣的人類而活著是多麼地困難。我的二哥楊趁，服毒而死時也是如此。總之，高邁的人類的腦髓是如何地受到束縛「高邁的人類是如何爲因應時代或制度而變得如此低劣？！（筆者譯）

《臺灣新聞》同時也刊載了當時在臺北放送局（廣播電臺）工作的劇作家，中山侑所寫的追悼文〈入田春彥君〉。雖然這篇文章長逾三千多字，但是非常清楚的傳達了入田的面貌，其中並提到入田有一本記載著他的煩惱、感想和翻譯的厚冊文藝剪貼簿的貴重資料。因此不畏煩瑣，引用全文：

從中南部旅行歸來的第二天下午，K君突然來訪，告知您悲哀的死亡消息。對我來說，實在是完全沒料想到的事。一時還懷疑其真實性。……總之，當我發現您已處於相異的幽冥界時，我對於您精神上的負債，感到難以言喻的苦悶。於是想借此文聊以表達對您生前的愧疚感。

這次去中南部出差，本來也想到臺中時，一定要和您見面，談談那之後您的情況。但是不知道您臺中地址的我，本來預定和您的善理解者，也是摯友的田中保男兄見面。然而抵達臺中的我，因爲忙著各種廣播工作，雖然也曾打過一次電話給田中兄，卻因爲他不在家而做罷。……如今只要想到那時刻，您已經昏昏沈沈睡在死亡的床上，而田中兄也無法陪伴您身旁，我就更懊悔自己的疏忽。如果有心務必和您見面的話，至少應該可以在您臨終時，陪伴在您床邊呀。如今，只能感嘆怎麼偶然來到臺中卻又沒見面！想來，我和您的交往決不是很長，相識的程度也不深。但是我們的友誼是



牢實結合於對藝術工作的深刻感動。我之所以認識您，因為還擔任臺中州蕃界警察的您，寄給當時擔任《警察雜誌》編輯的我，一封長信的緣故。那時，您不是對擔任《警察雜誌》編輯的我，而是透過我在報紙或雜誌上發表的詩和散文，邀我成為文學之友。您那封信曾經在《臺灣新聞》報的文藝版發表，是一篇以充滿才氣的筆致，勇敢述想說的事情的文章。一想到像您這樣在蕃界山區的人，一方面擔任警察工作，一方面又勤於文學創作。我仍記得當時我驚訝得瞠目結舌。記得後來和藤野雄士君見面時，從他那也聽到並相互談起各種關於您的事情。但是聽說您和藤野君也只是通信的筆友而已。

不久，我辭去《警察雜誌》進入放送局工作時，風聞您也辭去工作，下山到臺中，投靠田中兄，加入臺灣文學運動。不過那時我和您之間並未通信，不知不覺就忘記您的事了。

然而，不久，好像是去年夏天的事。藤野君來了一通電話：「臺中的入田君來到臺北，說無論如何想和您見一面。」於是在約定的BB，與您初次見面。和沈默寡言，卻又似乎充滿凜然意志的您，對坐著的我，那時才想起您曾經寄給我信函的事，您信中說：「我無法忍受沈悶死板的山中警察生活。」因而對於您下山投靠田中兄的一切，我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知曉在都會生活中從事文學工作的苦痛的我，那時並沒有勇氣隨便為您的將來祝福。

您和藤野兄就文學的話題談了許多，而我只是沈默地聽著。那時，您說您有一本向來剪貼、記載著自己的感想和翻譯之類的筆記簿，希望我能看一遍。我答應了並約定改天才拿，於是忙碌的我就先告辭回家。之後，我從藤野兄拜借了您的剪貼筆記簿，想慢慢閱讀之後，寫些批評之類的，但是懶散的我，最後竟什麼也沒做。

以後再見面是在去年年底，且是在除夕的夜晚。雖說是除夕，但是為了編製新年節目等等而忙到深夜。忙碌的我，那天晚上深夜十一點左右，才從放送局走路回家。一回到家，聽妹妹說，剛才有自稱從臺中來的客人一定要見我，說既然不在家待會還要再來拜訪，就離開了。我想不出是誰在這忙亂時節，尤其是在三更半夜，急著要見我，於是坐在桌前，感慨地寫著三十一日的日記。

而再次來訪的，竟是您和藤野兄。您說，因為今晚無論如何必須要回臺

中，所以一定要見到我。我從您們身上感覺到某種不尋常的緊迫感。但是說是談話，也並沒有什麼迫切的話題，只和上次一樣隨便雜談而已。只記得您說，過年後就要返回內地。年末匆忙，什麼也不能招待您們。不久送別了說要回去的您們二位。我和您們一起走到外面，在靜靜下起細雨的深夜中，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不能不擔心起您的安危。而坐上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計程車的您，向我問起所借筆記簿之事時，我因為還沒有看過而對自己的怠惰感到羞愧，一時無法作答。那一晚，目送搭載著您的計程車的車燈消逝在夜雨中，我深深感覺出您往文學之路，甚至往藝術方面工作的艱難。

啊！想來，那一夜，在雨中送別，竟是和您在這世間的最後一面。過年後，當那除夕夜的感慨在我的記憶逐漸變淡時，您從臺中打了一通長途電話到放送局，經由話筒傳來您的聲音：「火速，把那本剪貼筆記簿還給我！」那聲音表達了某種緊迫的情緒。記得第二天我以非常晦暗沈重的心情，寄還筆記簿。您真摯地期待著我對那本筆記簿的批判，但我卻以繁忙為由，毫無作為地就寄還給您。對這件事，我一直過意不去，始終無法終止自我的厭惡感。

以後我和您之間，再沒有交換任何消息。只是，偶而在《臺灣新聞》報片斷地拜讀您的作品，並為您的勇敢奮鬥祈禱。如今則再也無法和您相見了。我可以就我所知道的，書寫對於您的人格等感想。但是，與其敘述那些事情，現在我的內心充滿的只有懊悔而已。對於您屢次特別寄予我的厚意，我所回報予您的卻太過於微淺。聽說您是服毒自殺。即使不清楚您自殺的詳情，將這個時代和您的性格一起思考，我似乎也無法不完全瞭解。最後，祈祝冥福。（筆者譯）

一九九七年九月，筆者訪問楊資崩時，他回憶說，入田在自殺前，親手焚燒了所有相關的筆記本。

## 五、「轉向者」的文藝

以下略為介紹入田春彥的文藝活動。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臺灣新聞》的「學藝消息」欄，如下介紹入田春彥：

入田春彥氏，別名鄉親良、郷はるこ、高英、大伴英彥、洪春郷。辭去六

年的警察生活，目前滯居彰化溫泉旅館靜養，近日將返回鄉里。（筆者譯）

據此知道他曾使用各種筆名，發表過一些作品，由於入田生前常投稿的《臺灣新聞》，當時的報紙現在殘存情況不明，筆者無法完全閱覽該報。筆者目前只能就閱覽得到的該報所刊載的部分作品，嘗試瞭解他的文藝活動。入田春彥的作品大致可列舉如下：

(一)入田春彥譯：〈國際警察とは何か——リテラリイ・ダイツユストより〉，《臺灣警察時報》253號，1936（昭和11）年12月。

(二)郷はる子：〈マドリットにおける文化擁護國際作家會議〉，《臺灣時報》，1937（昭和12）年11月26日<sup>27</sup>。

(三)入田春彥：〈日錄抄〉，《臺灣新聞》，1937（昭和12）年12月17日。

(四)入田春彥：〈新約異解〉，《臺灣新聞》，1938（昭和13）年4月1日。

(五)高英：〈斷片錄〉，《臺灣新聞》，1938（昭和13）年4月1日。

入田春彥以本名發表的小文〈新約異解〉，是由題名「基督」、「加略人猶大」、「莎樂美」的三節所組成。猶大因為貪心出賣耶穌，後來反悔自縊身亡；莎樂美是公主，因愛上聖人而為愛反目成仇。喜好用「芥川式虛無」字眼的入田春彥，無疑地是深深傾倒於芥川龍之介（1892-1927）的文學世界。〈新約異解〉的體裁，明顯地是鑄裁芥川龍之介匯集基督格言的作品〈西方的人〉、〈續西方的人〉而成的作品。從這簡短文章來看，由於入田春彥本身不是基督教徒，他認為所謂的基督，實際上只是一位試圖打破古老倫理，為不斷追求新理想而苦惱，但內心又善良溫柔的人類。這樣的基督理解，是汲取他所親近的白樺派人道主義者的結果。

另一方面，反映入田春彥個人內心葛藤的，則是他關於「加略人猶大」的記述。可能入田春彥將作為從左翼而來的轉向者，現在卻成為帝國主義爪牙之殖民

<sup>27</sup> 由於筆者至今未能找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臺灣新聞》，無法知曉該作品內容。筆者是閱讀入田春彥〈日知錄〉記載，而得知該作品的存在。筆者推測內容大概是關於同年七月，在西班牙馬德里召開的第二屆文化擁護國際作家會議的感想文之類。根據日本《世界文化》一九三七年十月號，刊載關口弘的報告〈第二屆文化擁護國際作家大會〉，可知這會議是親蘇維埃、反法西斯、親左翼的文學家們，以支援西班牙人民戰線派政權為目的而召開的。可能是入田春彥閱讀《世界文化》等相關報導，整理出自己的心得而投稿《臺灣新聞》的吧。這篇作品的存在，顯示出殖民地警察入田春彥對國際左翼文學的動向，有超乎尋常的關懷。

地警察的自己，擬為猶太吧。「基督所流的血，必定也能讓猶太堅強地重新站立起來。」（筆者譯）這句話可說是入田春彥心靈的深切吶喊吧。入田春彥的這句話，讓筆者想起芥川龍之介作品〈徬徨的猶大人〉中的話語：「接受罪過，才有救贖。」<sup>28</sup>（筆者譯）

從入田春彥在剛脫離警察職務之後，立刻就發表的〈日錄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日常生活與讀書的一些端倪。〈日錄抄〉中記述著身心俱疲的、嚴厲的自省和自責的文字。大約在自殺前一個月所發表的〈斷片錄〉，也是一種自我反省的文章，可以看出入田春彥的誠實人品和容易受傷的性格。〈斷片錄〉中值得注目的是下列的一節：

我已下定決心，準備不顧死活，用身體，直接衝撞前去。

但是，總覺得奇怪，這是無法擊發的子彈嗎？

我的臉，像死人般發青。

而不知什麼時候，那把槍已被施以安全裝置了。（筆者譯）

這種文字表現和入田寫給葉陶的遺書「懷抱著炸彈，欣然勇赴死地的一個士卒」的話相當吻合。

就筆者目前所蒐集的些微資料，想要知道入田春彥自殺的直接原因，似乎並不可能。不過，綜合楊達的回憶，由於入田生前不但寫下揭發日本警察黑暗面的文章，而且還送一百圓巨款給總督府警察所不喜歡的臺灣人普羅作家的關係，而受到警察同仁的追究、拘禁，結果還被免除了警察職務。除了他和警察間的糾葛之外，他確實也懷有身體健康、思想和私生活上的苦惱。例如，根據上引楊達的談話，入田春彥曾寫過揭發他當時所供職的臺中警界內幕的文章。入田春彥對警界的不滿，對警察的批判，到底是什麼樣的體事情？另外，前引中山侑的追悼文〈入田春彥君〉，也提及入田的文章勇於表述個人意見、勇敢奮鬥、性格與時代等字彙。這些無論是在討論入田春彥，或探討他的自殺動機時，都是重要的問題。可惜，像這樣的告發文章，筆者因沒有機會閱讀而無法知曉。不過，入田春彥發表於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臺灣新聞》的作品〈日錄抄〉，有一段文字則透露出對住在臺灣的日本人的憤慨和不滿：

在殖民地的本國人文化水準低劣，這個傢伙、那個傢伙都是軍事狂。（筆

<sup>28</sup> 藤井省三：〈さまよえるユダヤ人傳説をめぐって〉，《現代中國の輪廓》（東京：自由國民社，1993年），頁13-21。

者譯)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健康狀態，應該也是入田春彥自殺的原因之一。如前所述，他在警察官練習所受訓時，就曾病倒而延遲結訓，且他曾在當時臺灣原住民魯凱族居住的山區，駐守了一年四個月。對他身心的健康必有所傷害，這也成為他的苦惱之一。在〈日錄抄〉的「三七年十一月二四日」項中，入田寫著：「我想山中一年四個月的生活損壞了我的身體（這幾句是以極厭惡的心情寫的），今年六月以後，我的身體就不再平靜。」（筆者譯）而前引中山侑的追悼文中，也曾引用入田春彥所寫「我無法忍受沈悶、死板的山中警察生活」（筆者譯）的一句話。

另一方面，從〈斷片錄〉也浮現出有關女性問題的可能性。可以說入田春彥以「在所有女人之中都活著莎樂美。」（筆者譯）這句話，做總結作品〈新約異解〉的第三節中，說明了他的女性觀。又，自由詩形式作品〈日錄抄〉寫著：「對愛慕的女人，就說愛慕；對不愛慕的女人，不做出愛慕的樣子。被所愛慕的女人拒絕，而悔恨的話，就哭一個晚上吧。因為我只是隨意地愛慕，而對方也任意地拒絕而已。但是，我不會一直都哭泣著。即使哭泣的話，也只一個夜晚就結束。」（筆者譯）這〈日錄抄〉是以「我的人生不是只有女人而已」（筆者譯）作為結語。從這裏大概也可以臆測入田春彥自殺的另一可能原因，或許也有女性問題的成分吧。

但是，入田春彥自殺的最重要的直接契機，應該仍是他作為轉向者的苦惱。入田到臺灣前，在東京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形式參加左翼運動，或親近左翼思想，目前尚無體資料。因此已經無法知道他是否屬於正式的左翼運動家。不過，楊遠在「對談」中，則是相當清楚地表明，入田曾作為左翼思想系統的知識人經歷，這件事情絕對不能輕視。

內村：這也是我個人的推測。那時，在日本，從事左翼運動的同伴之間，互相詢問對方的經歷是絕對的禁忌。這是因為預設萬一被逮捕而受到拷問，為保護組織而不得不如此做。從他確實徹底遵守了這個鐵則，其身分大概可以想像出某種程度。他連死後的事情都委託楊遠先生代為處理，卻還不表明自己的經歷。從這點來推測，大致就知道他是什麼來路的人。

楊：我也這麼猜測。（筆者譯）

在和楊遠的交友中，入田必定使用過左翼的言語，極為間接的暗示自己的左翼經

驗。甚至，前引臺灣總督府御用色彩濃厚的《臺灣日日新報》關於入田春彥自殺的報導，特別以「因『○○』而依願免職」，明白表示入田春彥有「赤化」身分，和左翼思想或運動有所關連。因此，入田即使不是真正的左翼運動家，至少應該也是對當時左翼思想有所共鳴的知識人。只是，從現存入田春彥的小品文推測的話，他的左翼思想並不純然是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而是「白樺派」的人道主義色彩。左翼思想者轉向後，通過嚴格的身家調查而成爲警察，在那個時代也並非不可能的事情<sup>29</sup>，且直到現在入田的親族中仍有多位以警察爲職務的<sup>30</sup>，大概當時他們也幫過忙。

成爲警察之後的入田春彥，將自己懷抱著的革新理想，以「爆彈」來表現。這個「爆彈」對於無法積極參加社會改革的入田春彥來說，是個「不發彈」。如此，他的無力感正是所謂的「芥川式虛無」。又，他喜歡教楊資崩唱當時剛流行的軍歌「勝利歸來」之事，應該可以認爲，他是將自己作爲改革社會的「一個士卒」的願望，寄託在歌曲裏。

入田春彥生前閱讀些什麼書籍呢？楊遠在「對談」中說：「入田先生每月訂購美國的《新麥塞斯》，也閱讀英文版的《莫斯科新聞》。」（筆者譯）又，從前述入田的作品，知道入田春彥不但通曉英文，關心國際局勢，也翻譯介紹文章。另外，從入田春彥的現存作品，也可以知道他生前閱讀書籍的蛛絲馬跡。例如，〈日錄抄〉文中，他提過阿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巴爾札克（Honore de Balzac）、鮑羅丁（M. M. Borodin）、托爾斯泰（L. N. Tolstoi）、巴比賽（Henri Barbusse）、高爾基（Maksim Gorkii）、木下尚江、鹿地互、宮本百合子、葉山嘉樹和藤森成吉等人。另外，從一張入田春彥站在書齋前的相片<sup>31</sup>，也可以看到他收存在書架上的大量書籍。這張相片清楚地映有《鮑羅丁逃亡記》、消洛霍夫（M. A. Sholokhov）《被開闢的處女地》、藏原惟人的著書、小林多喜二的評傳、《有島武郎全集》、《武者小路實篤全

<sup>29</sup> 參見宮下弘：《特高の回想—ある時代の證言》（東京：田畑書店，1980年），頁24-27。

<sup>30</sup> 一九九七年五月，筆者訪問宮崎時，根據入田的妹妹江藤タツ的談話，入田二姊リツ的夫婿梅橋秀雄當時擔任警察職務。

<sup>31</sup> 參見註22。一九九七年五月，筆者訪問江藤タツ時，將入田春彥的這張相片給她看後，她就哭泣起來。她回憶說，相片中春彥所穿的日式和服，是入田即將渡海到臺灣前，四個姊妹們一起爲他選購布料，由大姐チツ親手裁製而成的禮物。

集》、剪貼筆記簿和《大魯迅全集》<sup>32</sup>全七卷等等。這些藏書在入田去世後，全部歸楊逵所有。

關於入田春彥所有的《大魯迅全集》，楊逵在「對談」有如下的述：

在入田先生的遺物中，有改造社出版的《大魯迅全集》（一九三七年二月至八月刊行，全七卷），我因為被託付了他的書籍，而得以正式閱讀魯迅文學。（筆者譯）

臺灣光復前，受中國大陸新文學運動的影響，臺灣人民主編發行的《臺灣民報》曾經陸續轉載過魯迅的〈鴨的喜劇〉、〈故鄉〉、〈犧牲謨〉、〈狂人日記〉、〈魚的悲哀〉、〈狹的籠〉、〈阿Q正傳〉、〈雜感〉、〈高老夫子〉九篇作品<sup>33</sup>，對於臺灣人民的魯迅觀頗有啟發。但是，沒有機會學習中國現代語文的臺灣人民，尚無法直接正式親近完整的魯迅作品，如同楊逵所說，他正式閱讀魯迅文學，是獲得入田春彥《大魯迅全集》以後的事。即使想閱讀被翻譯成日語的魯迅作品集，也不容易。戴國輝在「對談」裏說：

我已去世的哥哥，在東京曾因為擁有這套書，而被憲兵隊逮捕。臺灣的留學生即使在東京，《魯迅全集》也是禁書。因此，我想能將這些書帶入臺灣，更是困難的事情。入田春彥氏能夠將《魯迅全集》拿到手，畢竟是日本人的一種特權。（筆者譯）

總之，楊逵之所以能親近完整的魯迅文學，是因為接收了入田春彥所擁有《大魯迅全集》的緣故。關於楊逵是否受到魯迅文學的影響問題，是今後的重要研究課題，而入田春彥生前顯然並沒有預料到自己竟成為楊逵對於魯迅文學，也是臺灣大多數人民閱讀〈阿Q正傳〉的間接仲介者的事實。當然，入田春彥本人對魯迅也相當關心。在楊逵遺族所保存的入田春彥親筆殘稿中，寫著關於魯迅舊居的事情：

<sup>32</sup>《大魯迅全集》是佐藤春夫、增田涉、山上正義、井上紅梅等人合譯，一九三七年，改造社出版。關於日本翻譯介紹魯迅情形，詳藤井省三：〈佐藤春夫と岩波文庫《魯迅選集》〉，《アツア遊學》(25)「特集：東アツアが讀む魯迅」（東京：勉誠出版，2001年），頁142-148。

<sup>33</sup>詳林瑞明：〈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魯迅與賴和〉，《臺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3年）頁299-317。本文日譯後改題〈魯迅賴和〉，收入中島利郎編：《臺灣新文學と魯迅》（東京：東方書店，1997年），頁89-105。中島利郎：〈日本統治下の臺灣新文學と魯迅—その受容の概観〉，《臺灣新文學と魯迅》，頁47-87。中譯本《臺灣新文學與魯迅》（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

對文化的關心，使我走到魯迅的舊居。  
魯迅的晚年因蔣介石政權的嚴格追究，  
導致、用他的話就是  
「用腳逃跑比用筆來為還忙」的生活。  
他的舊居的白墜牆壁，現在也為紅葛藤的葉子纏絡，  
□□□□魯迅□□□□  
又，到了現在，好像反芻著對□的思慕  
我不想妨害H氏的冥想，就一個人離開，轉到後面的出口去看。  
好像是市政府的小吏、斷髮、高跟鞋的中年婦人，  
H氏在魯迅生前似乎訪問過他的這個舊居幾次。（筆者譯）

當然這不是入田春自己的回想，大概是他讀了阿格尼絲·史沫特萊等人的著作後摘錄的。臺灣人作家對於同時代的中國文學的接觸，竟是經由日本人，且是帝國主義殖民地尖兵的臺灣總督府日本警察之介紹，可以說是殖民地時代的特異現象。

## 六、楊逵和魯迅文學

楊逵和入田春彥交往的結果之一，使他能夠親近魯迅文學。不過，在經由入田春彥而接觸魯迅文學之前，事實上楊逵和魯迅早已有過間接的聯繫。那就是本文第一節所述魯迅的弟子胡風在一九三六年，將楊逵的成名作〈送報伙〉翻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的讀者<sup>34</sup>。而楊逵自己也相當關心魯迅的事情，當魯迅逝世時，楊逵在他所創辦的雜誌《臺灣新文學》的第一卷第九號（1936年11月），刊載了未署作者名的卷頭語〈悼魯迅〉<sup>35</sup>和黃得時〈大文豪魯迅逝世——

<sup>34</sup>「對談」中楊逵曾經說：「日本戰敗後，有許多大陸來到臺灣的中國人都來看我，他們都是透過胡風譯的〈送報伙〉知道我的名字，才對我的事情有所瞭解。」（筆者譯）

<sup>35</sup>楊逵創辦《臺灣新文學》不久，就和妻子葉陶因過度勞累而雙雙病倒。該雜誌自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是由王詩琅（1908-1984，筆名王錦江）代為執行編輯事務。根據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的王詩琅訪談記錄：「我正在編輯《臺灣新文學》時，魯迅死了……。魯迅之死，誰來寫卷頭言。我對楊逵說，你自己來寫。楊逵說：那種事情你比較清楚，就叫我寫。《臺灣新文學》卷頭言的〈悼魯迅〉……就是我寫的。」（筆者譯）（見下村作次郎：〈王詩琅が語る臺灣新文學運動〉，《文學で讀む臺灣》〔東京：田畑書店，1994年〕，頁300）中譯本《從文學讀臺灣》（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中島利郎亦曾



其作品和人生之回顧》兩篇文章。但是楊逵自己撰寫有關魯迅的作品和文章，則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結束臺灣殖民統治以後的事。

中島利郎編《臺灣新文學與魯迅》一書所收各論文，對於臺灣的魯迅受容和影響有詳盡的考察。其中陳芳明的論文〈魯迅在臺灣〉<sup>36</sup>，對於戰後初期臺灣魯迅受容，指出一九四六年臺灣文化協會出版《臺灣文化》「魯迅逝世十週年特集」所收載的八篇文章，除臺大教授楊雲萍的〈紀念魯迅〉以外，其他都是出自大陸作家之筆。而當時曾和魯迅有過親密交往，戰後渡海來到臺灣的幾位大陸作家，除了許壽裳<sup>37</sup>之外，其他如李霽野、李何林、臺靜農、黎烈文等人，對介紹魯迅及其文學給臺灣，並不熱衷。相對地，根據蘇新的〈也漫談臺灣藝壇〉，可以知道當時楊逵對介紹魯迅文學的熱情是值得記述的：

當魯迅逝世十週年的九月十八日，臺灣報紙雜誌雖多，除本地人小說家楊逵先生在臺南《中華日報》，以日文發表一篇文章〈追悼魯迅先生〉的文章，及本地文化人創辦的雜誌《臺灣文化》，編了一期「魯迅逝世十年紀念特輯」以外，竟然沒有一報一誌刊出紀念魯迅的文字。外省人中間，自上至下，除魯迅在世的好友許壽裳先生及魯迅的學生黃榮燦、雷石榆兩先生以外，竟然沒有一個人想起這個一生被壓迫的不幸的文豪的結局。在光復之臺灣紀念魯迅的，還是被認為「奴化了」的臺灣人。<sup>38</sup>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為紀念魯迅逝世十週年，楊逵分別在《中華日報》日文

---

撰文考察該篇文章確是王詩琅所撰寫（見中島利郎：〈《臺灣新文學》の追悼文について〉，《臺灣文學研究會會報》第2期〔1982年12月〕）。不過，當時編輯事務雖由王詩琅代理，《臺灣新文學》整體編輯方針仍相當程度地反映了楊逵個人的意識。同篇訪談記錄中王詩琅又說：「只有《漢文創作特輯》是按照我的企劃編輯。我並不能直接邀稿，文章全都是由楊逵委託而得。我只是將楊逵寄來的文章加以編排。」（頁309，筆者譯）又，根據《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八號〈編輯後記〉記載，王詩琅代為執行編輯期間，日文稿件的寄送地址，仍舊是楊逵所居住臺中的臺灣新文學社的社址。此外，一九七八年王詩琅也曾撰文回想他代理編務期間，楊逵經常到臺北積極參與編輯事宜：「那時候，他倆因病，而且承印的印刷所又改在臺北，所以他倆便把編務委由筆者辦理。因此，楊逵兄常來臺北，業務辦完後，我們大都來個便餐，餐時酒當然是不能免的。楊逵兄酒量很好，紅露酒一瓶又一瓶，非到面紅耳熱，不肯罷手。」（王詩琅：〈好漢剖腹來相見—楊逵畫像序〉，收入林梵：《楊逵畫像》〔臺北：筆架山出版社，1978年〕）。

<sup>36</sup> 陳芳明：〈臺灣における魯迅〉，中島利郎編：《臺灣新文學と魯迅》，頁14-22。

<sup>37</sup> 許壽裳：《魯迅的思想與生活》（臺北：臺灣文化協會，1947年）。

<sup>38</sup> 蘇新：〈也漫談臺灣藝壇〉，《臺灣文化》第2卷第2期（1947年1月）。

版以及《和平日報》<sup>39</sup>副刊上發表中、日文詩：

〈魯迅を紀念して〉  
「俺に寸鉄あり」と  
魯迅はひまなかつた。  
貧困と汚穢の環境に立ち  
銃劍の追跡に双向ひながら  
魯迅は人間精神の清掃夫だつた。  
低劣なるものと反動なるものに向つる  
吶喊また吶喊と。  
魯迅は獅子奮迅したのであつた。  
敢罵、敢打、敢哭、敢笑  
魯迅は常に青年であつた。  
今や至るところに  
魯迅の声を聞き、継承者達の心に  
魯迅の至誠と熱情を見る。  
魯迅は人間精神の清掃夫だ  
永遠に生きた革命の目じるしだ。

〈紀念魯迅〉  
吶喊又吶喊，真理的叫喚；  
針對惡勢力，前進的呼聲！  
敢罵又敢打，青年的壯志；  
敢哭又敢笑，青年的熱腸；  
一聲吶喊，萬聲響應；  
如雷又如電，閃閃、爍爍！  
魯迅未死，我還聽著他的聲音！  
魯迅不死，我永遠看到他的至誠與熱情！

<sup>39</sup> 參見下村作次郎：〈戰後初期臺灣文壇と魯迅〉（中譯：〈戰後初期臺灣文壇與魯迅〉），收入《臺灣新文學と魯迅》，頁141。黃英哲：〈魯迅思想の傳播をめぐつて—臺灣文化における「中國化」と「世界化」の相克〉（中譯：〈戰後魯迅思想在臺灣的傳播〉），收入《臺灣新文學と魯迅》，頁172。

一九四七年一月，楊逵出版《阿Q正傳》中、日文對照本，作為「中國文藝叢書」之一，由東華書局出版。楊逵寫了題為〈魯迅先生〉的卷頭語：

#### 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本名周樹人，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省紹興府。年幼時，家有水田四、五〇畝，生計相當優裕。但在十三歲時，祖父因某事件入獄後，家運就急速中落，寄寓親戚家時，曾被喚為乞丐。先生在最初的小說集《吶喊》的序文中記載，曾因父親罹病長達四年，他幾乎每天進出當舖和藥房。有人說鋼鐵因鍛鍊而更堅固，先生不屈不撓的精神不就是在此期間鍛鍊而成的嗎？之後，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午前五時二十五分，先生以五十六年生涯告終前，先生經常因作為被迫受害者與被壓迫階級之友，而一再重複血淋淋的戰鬥生活，平日固然忙於用手筆耕，有時更得忙於用腳逃命。說是逃命，或有卑怯之感。但筆與鐵砲之戰鬥，作家與軍警之戰鬥，最終，大部分仍不得不採取逃命的游擊戰法。如此，經由先生這般不屈不撓的戰鬥生涯，使被迫受害者的戰鬥意志更為強韌，組織也益形堅固。……在此所譯《阿Q正傳》是先生代表作，這是向應受到咒詛之惡勢力與保守主義宣告死刑。懇請細膩吟讀。只要不揚棄此等惡勢力與保守主義，我們一步也無法前進。（筆者譯）

從這些詩文可以看出，當時楊逵是如何看待魯迅這位文學家，如何認同魯迅精神。對當時的楊逵來說，魯迅是一位「人類精神的清道夫」、「被壓迫階級之友」，並且是位手持「寸鐵」和反動勢力、保守主義戰鬥的戰士。文中無疑地楊逵是將自己的過去和魯迅的生涯重疊，也就是說楊逵也將自己定位（至少在一九三七年之前）是一位戰鬥型作家，他高揚的旗幟就是「為大眾的藝術」和「行動主義的文學」。楊逵形容魯迅是「筆與鐵砲戰鬥，作家與軍警戰鬥，最後，大部分還是不得不採取逃命的游擊戰法」。這正是日本統治臺灣期間，被逮捕十次，總計待在監獄三個月的楊逵自身感慨的投影。光復後不久，楊逵從魯迅身上找到作為自我延伸的理想圖像。

但是，楊逵將魯迅視為一己的投影的看法是否妥當，則仍有商榷餘地。魯迅的最大敵人是舊中國傳統社會的愚昧、因襲、不正；而楊逵的首要敵人則是日本總督府的殖民統治。兩大敵人雖都是壓迫者，但是舊中國並不同於日本帝國主義。

一九四七年一月，《文化交流》第一輯刊載楊逵〈阿Q畫圈圈〉，其中一節

如下：

禮義廉恥之邦，在這一年來給我們看到的，已經缺少了一個信字，圓圈欠了這一角，在阿Q總要一抖一抖的使其合縫，不幸向外一聳，畫成瓜子模樣，是他生怕被人笑話，以為「行狀」上的一個污點的。禮義廉恥之士的靈魂與思想，比步上阿Q的生怕被人笑話，在缺少做人條件的我們看來，有點辛酸。打倒敵人以來，時間已經過了不短的一年餘了，我們總願結束了一番武劇，來編排一齣建設的新戲，拖來拖去總難得使這個圈畫得圓圓的。我們平民凡夫都是要看看所謂「幸福結尾」的大團圓，一齣劇要演到大團圓，總不得在「路絲腳」的戲臺上演，雖有幾個禮義廉恥欠信之士得在此大動亂之下再發其大財，平民凡夫在飢寒交迫之下總會不喜歡他們的。

就楊達看來，一九四五年光復後的臺灣，至今（一九四七年）尚未看到任何「幸福的結局」，或「大團圓」的徵象，而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禮義廉恥之士」失信的緣故。誠如黃英哲所說：

楊達所指的「禮義廉恥之邦」，當然是指中國，而在動亂中大發其財，使平民凡夫陷於飢寒交迫的「禮義廉恥欠信之士」，指的是大陸來臺的一部分貪官污吏。<sup>40</sup>

可以看出楊達經由撰寫紀念魯迅的文章，間接批判新近自大陸來臺的統治者。就楊達來看，這批新的統治者，就是魯迅終其一生毫無間歇地進行批判的中國舊勢力的代表。楊達和魯迅文學之間的關聯，很遺憾地光復後就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一九四九年四月，楊達因起草〈和平宣言〉而被關入監獄，直至一九六一年。

戰後不久的楊達，對於魯迅的中文作品究竟能理解多少，不無疑問。一九四七年，楊達編著《阿Q正傳》<sup>41</sup>的中、日文對照譯本時，毫無疑問地，應該就是參考過入田春彥《大魯迅全集》中的日語翻譯。至於楊達編著《阿Q正傳》的正確性如何，留待他日另文詳細考察。

<sup>40</sup> 同註39。

<sup>41</sup> 《阿Q正傳》（臺北：東華書局，1947年）《中華文藝叢書》第1輯，全文約200頁。

## 七、楊逵和入田春彥交往的意義

經由本次調查，大概可以了解入田春彥來臺之前，曾以某種形式和左翼運動有所關連，或對左翼思想有所共鳴。也大致明白他到臺灣成為警察之後，由於瞭解在殖民地臺灣的日本警察之黑暗面，而為工作單位和自我良心之間的糾結而煩惱痛苦不已。懷著這樣的愁悶，又愛好文學的入田春彥和正為左翼運動、農民運動的挫折所苦的楊逵之交往，從兩人擁有共通的精神層面來看，應該是很自然的發展。楊逵和入田春彥的交往雖然短暫，但對楊逵而言卻極富意義。一九三七年，對楊逵來說是充滿挫折的一年。他所主辦的《臺灣新文學》雜誌，在這一年的六、七月號廢刊，同年他再次到東京，卻得不到任何實質的成果。回臺灣後，陷入與妻子葉陶雙雙病倒，又因欠債被告等走投無路的生活窘境。這時如果沒有入田春彥突然的經濟援助，楊逵恐怕無法重建生活秩序，楊逵的文學生命大概也就此結束。楊逵能夠得到首陽農場這塊小小的生活補給地，並得以在一九四九年被捕入獄前，能夠繼續文學創作活動，可說都是日本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地侵略的先頭部隊——警察，入田春彥的援助的關係。尤其，楊逵經由閱讀入田所遺留下來的《大魯迅全集》而接觸魯迅文學的這件事，可以說在臺灣文學史，和臺灣、中國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特殊意義。此外，兩人的交友也可以視為戰前期日本和臺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側寫。

根據本論文前引楊逵所述，入田春彥是因為閱讀楊逵小說〈送報伙〉受到感動，而委託《臺灣新聞》記者田中保男介紹認識。那麼，銜接楊逵與入田春彥的〈送報伙〉，究竟是怎樣的小說呢？這篇小說的主旨，可以說是行動主義與臺、日被壓迫者的團結宣言。一九三四年發表〈送報伙〉後，楊逵創辦《臺灣新文學》時期，他主張為大眾的藝術，提倡行動主義的文學。在一九三五年發行的《臺灣文藝》第二卷第四號，所發表短文〈行動主義的檢討〉，楊逵繼承船橋聖一的能動主義，極力主張行動主義的必要性。一九三五年在日本發行的雜誌《行動》第三卷第三號，楊逵以臺中市健兒的筆名，發表〈行動主義的擁護〉一文，更詳細地闡述行動主義。這篇文章的論旨，與〈行動主義的檢討〉的論旨幾乎一致。根據〈行動主義的擁護〉所說，行動主義可區分為反動的法西斯式行動主義和進步的行動主義。反動的法西斯式行動主義的文學，其結果將是：「無法整體性地看待現實社會的所有現象與動向，或變成為了曲解現實的說謊文學。」想真

實地描寫事實的進步文學者，不但絕不放棄自己的行動主義，另一方面還要排除萬難地對抗反動的行動主義。以上是健兒，也就是投稿人楊達的主張。

楊達的這種行動主義在〈送報伙〉中已明白顯示。小說〈送報伙〉描述留學東京的臺灣青年楊君，因生活困苦，打工送報。這期間他不僅被惡質的派報處負責人任意驅使，還被藉故扣押了保證金，最後甚至連一點工資都領不到。窮途末路的楊君，正不知該怎麼辦才好時，日本人田中告訴他，勞動者必須團結一致的重要性，還介紹他認識一位叫伊藤的勞動者運動家。於是，他們聯合其他受害的送報伙，對派報處進行罷工。抗爭的結果，送報伙們的要求終於獲得合理解決。經過這事件後，楊君確信經由合作團結的行動體驗，以及活用由此而得的教訓，才能貫徹實踐因自殺身亡的母親之遺志，並決定返回臺灣，為臺灣的明天奮鬥。

由於〈送報伙〉小說的篇末結束得過於樂觀與粗糙，所以當這篇小說獲得東京《文學評論》獎時，評審委員曾有「形象化不足」或「主觀的幼稚性」等批評。又因為小說中對於送報伙們從決定罷工，到實際罷工運動的體經過，完全沒有提及，且原應與全篇主題相結合的勞動者的體性格也不明顯，而留下一個遺憾<sup>42</sup>。但是，日本內地與殖民地臺灣的被壓迫者與被榨取者，必須團結合作的這種行動主義，正是楊達與入田春彥認識前所持有的一貫信念。令入田春彥主動接近楊達的力量，也就是〈送報伙〉所提示的樂觀行動主義，以及日、臺被壓迫者與被榨取者的團結行動主義。

對警察入田春彥而言，要將〈送報伙〉提出的那種行動主義付諸實行，雖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成為警察的入田心中依舊燃燒著對改革社會行動的熱情。前引入田春彥的作品所見「不發彈」的話語，可以考量是指他對革命的直接行動的熱情或衝動，而他對革命的直接行動的熱情，最後只能無力的以「不發」作結束，產生了他所謂「芥川式虛無」。據說芥川龍之介在晚年，也有某種程度的左傾思想<sup>43</sup>，如果說芥川龍之介自殺的理由之一，是因為他既苦於日本社會的矛盾，又惱於無法進一步參加革命運動的無力感的話，那麼，也就比較容易明白同樣懷有無力感的入田春彥之所以愛好「芥川式虛無」這句話的原因。入田春彥透過〈送報伙〉，認識行動主義的臺灣人作家楊達，而能夠將自己無法實現的夢想託付與他。如同前述，〈送報伙〉這篇作品所提倡的行動主義與團結主義，雖稍

<sup>42</sup> 《文學評論》第1卷第8號（1934年10月）。

<sup>43</sup> 參見宮本顯治：〈敗北の文學—芥川龍之介の文學について〉，《宮本顯治文藝評論選集》第1卷（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80年），頁3-32。

顯粗糙，但正是楊逵所主張的素樸性與樂觀性，反而緩和並鼓舞了入田春彥的心靈。

楊逵主張的所謂團結合作，例如對於報社派報處負責人不法行為的抗爭，不僅是送報伙們的團結，也廣泛地意味著這些單純勞動者和田中這樣的知識階層勞動者的合作團結，甚至也可以發展成日本與臺灣的所有被榨取、被壓迫群體的連帶團結。小說中楊君到日本留學前，一直以爲日本人都是壞人，直到接觸田中和伊藤後，才明瞭日本和臺灣一樣，也有好人與壞人，有虐待者與受虐待者的對立關係。這雖然是單純樸素的認識，但是楊君或楊逵卻由此產生了日、臺受欺壓者立場一致的團結思想。作品中，楊逵和說著「欺負你們，欺負我們的，都是同種類的人」的伊藤，緊緊握手的場面，正是楊逵表達臺、日受欺壓者團結的象徵。入田春彥雖然是站在日本殖民者官方立場的警察，但是他幫助困窮的臺灣楊逵，援助楊逵的行動主義文學。經由成爲這樣的援助者，入田春彥可以說是擔綱了〈送報伙〉作品，幫助楊君的田中的角色。或許可以說入田經由〈送報伙〉認識作者楊逵，而從中找到一線光明，也就是說入田經由援助楊逵，而發現與被壓迫者的臺灣民衆的聯繫，因而瞭解自己的存在意義，入田春彥經由幫助楊逵，而讓自己也得到救贖。當然只要身爲一天的警察，入田春彥就無法從矛盾中解脫。結果入田無法忍受因這樣的矛盾所帶來的空虛感而選擇自殺。入田春彥遺書所說「懷抱炸彈，欣然勇赴死地的一個士卒」，是否意味著他是用死來進行一種對國家社會的抗議呢？如果這推測是正確的話，可以說入田春彥至死都表達了他對受壓迫者的支持態度，可算是〈送報伙〉行動主義的實踐者。

## 楊逵和入田春彥 ——臺灣作家和總督府日本警察

張季琳

楊逵是日據時期臺灣重要日語作家之一，一九三四年，他以日文小說〈送報伙〉獲得日本文學獎項，成為臺灣第一位踏入日本文壇的作家。在他晚年的自述中，提及幾位對他個人生活和文學生涯有決定性影響的日本友人，年輕的臺灣總督府日本警察入田春彥（1909-1938）就是其中一位。入田閒暇時致力於文學創作，曾投稿於臺中出版的日文報紙。楊逵和入田春彥的友誼，起於一九三七年的秋天，這位年輕的警察因閱讀〈送報伙〉而有極深的印象，遂去拜訪楊逵，並致贈月薪兩倍的鉅款一百圓。貧困與病痛交集的楊逵，如果沒有入田春彥的經濟資助，無疑地將無法繼續其文學活動。這份友情持續約九個月之久，直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入田春彥因被免職，而以自殺結束生命。楊逵與入田春彥交往的時間雖極短暫，卻為楊逵的文學生涯帶來重大轉機。特別是入田春彥將魯迅介紹給楊逵這一件事，更使得入田春彥的出現，具有特殊意義。因此，本文嘗試調查入田春彥的出身、經歷、背景和自殺情形，並揭開入田春彥如何將魯迅文學介紹給楊逵的謎底，從而確認入田春彥對楊逵的影響，比歷來所能想像的更大、更多。



# Yang Kui and Nyuta Haruhiko O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a Taiwanese Proletarian Novelist and a Police Officer in the Service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ZHANGJi-lin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literary movement of modern Taiwan, Yang Kui (1905-1985) produced several excellent novels in Japanese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A Newsboy," one of his most acclaimed, earned him a literary prize from an important Japanese journal in 1934. In a talk late in his life he mentioned Nyuta Haruhiko (1909-1938), one of his Japanese friends who exerted decisive influence on him. Once a young police officer under Taiwan's Japanese colonial rule, Nyuta devoted his leisure to literature and contributed some pieces to Japanese newspapers based in Taizhong. Yang and Nyuta's friendship began in the autumn of 1937, when Nyuta, who had read "'A Newsboy'" and been deeply impressed by it, paid Yang a visit and presented him with a large amount of money. Yang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illness and financial difficulties; without the economic aid from Nyuta, his literary career would certainly have been thwarted. This friendship lasted for about nine months, until May 1938 when Nyuta committed suicide. This unusual friendship between an anti-colonialist Taiwanese novelist and a Japanese police officer, who was, in a sense, an agent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deserves critical attention.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life of Nyuta and the circumstances leading to his suicide, and to throw ligh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brief but vital friendship in the development of Yang's literary caree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t was Nyuta who initiated Yang to the contemporary trend of Chinese literature represented by Lu Xun.

Keywords: Yang Kui      Taiwanese writer      Nyuta Haruhiko  
Lu Xun's literary writings

